



大夏教育文存

刘佛年卷

主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孙丽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夏教育文存

刘佛年卷

主 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孙丽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夏教育文存. 刘佛年卷/杜成宪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675-6037-6

I. ①大… II. ①杜… III. ①教育学—研究—中国
IV. ①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5797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大夏教育文存 刘佛年卷

主 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孙丽丽
策划编辑 王 焰
项目编辑 金 勇
审读编辑 余 强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1
字 数 33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037-6/G·10044
定 价 96.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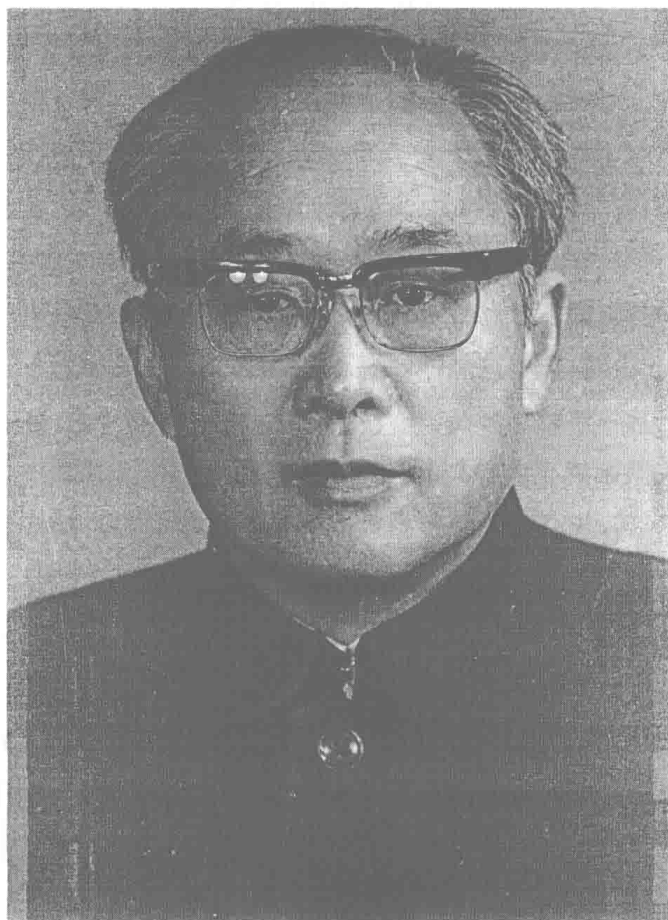
《大夏教育文存》编委会、顾问名单

编委会

顾问 孙培青 陈桂生

主任 袁振国

委员 叶 澜 钟启泉 陈玉琨 丁 钢
任友群 汪海萍 范国睿 阎光才



刘佛年先生(1914年—2001年)

一

1951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时,也成立了教育系,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之源。当时教育系的教师来自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等高校教育系科,汇聚了一批享誉全国的著名学者,堪为当时中国教育理论界代表。如:国民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曾实施部聘教授制度,先后评聘两批,各二三十人,集中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各个学科的顶尖学者。两批部聘教授里均只有一位教育学教授,分别是孟宪承、常道直,后来都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孟宪承还为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建国”、保证中学师资培养的考虑,建立了六所师范学院,其中五所附设于大学,一所独立设置,独立设置的即为建于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院长为廖世承,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师范学院(后为上海师范大学)院长;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奠定中国社会事业研究的基础的言心哲,曾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后转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从事翻译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曹孚,后为支持中央政府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奉调入京;主持撰写新中国第一本《教育学》、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就是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60多年的发展基础。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著名学者当年藉以成名并影响中国现、当代教育学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未能流传于世,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著作甚至湮没不闻,以至今天的人们对中国教育学科的由来与发展中的诸多重要环节所知不详,尤其是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对于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性知之甚少,而这些成果中的相当部分实际上又可以看成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国化探索的代表作。因此,重新研究、整理、出版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学术传承、对于中国的教育学术传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建校之初,在教育系教师名册上的教授共有27位,包括教育

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当时身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的曹孚被任命为教育系系主任,但由于工作原因晚一年到职,实际上教育系就有教授 28 位。除个人信息未详的二位外,建系教授简况见下表。

出生年代	姓名(生卒年)	建校时年岁	学历、学位
1890—1899	赵迺传(1890—1958)	61	大学肄业
	廖世承(1892—1970)	59	博士
	张耀翔(1893—1964)	58	硕士
	高君珊(1893—1964)	58	硕士
	欧元怀(1893—1978)	58	硕士
	孟宪承(1894—1967)	57	硕士
	谢循初(1895—1984)	56	学士
	黄觉民(1897—1956)	54	硕士
	萧孝嵘(1897—1963)	54	博士
	黄敬思(1897—1982)	54	博士
	常道直(1897—1992)	54	硕士
	沈百英(1897—1992)	54	五年制中师
	言心哲(1898—1984)	53	硕士
	陈科美(1898—1998)	53	硕士
	方同源(1899—1999)	52	博士
1900—1909	赵廷为(1900—2001)	51	大学预科
	左任侠(1901—1997)	50	博士
	谭书麟(1903—?)	48	博士
	萧承慎(1905—1970)	46	硕士
	胡寄南(1905—1989)	46	博士
	赵祥麟(1906—2001)	45	硕士
	沈灌群(1908—1989)	43	硕士
	朱有璈(1909—1994)	42	学士
1910—1919	曹孚(1911—1968)	40	博士
	刘佛年(1914—2001)	37	学士
	张文郁(1915—1990)	36	学士

(本表参考了陈桂生《华东师范大学初期教育学习纪事(1951—1965)》一文)

可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初建、教育学科初创时的教授们,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15人,20世纪00年代的8人,10年代的3人;60岁以上1人,50—59岁16人,40—49岁7人,40岁以下2人,平均年龄50.73岁,应属春秋旺盛之年。他们绝大部分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有不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其中博士8人,硕士11人,学士4人,大学肄业1人,高中2人。他们大体上属于两代学者,即出生在19世纪90年代、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代(五六十岁),出生在20世纪、于二三十年代完成学业的一代(三四十岁)。对于前一代学者而言,他们大多早已享有声誉且尚未老去;对于后一代学者而言,他们也已崭露头角且年富力强。相比较而言,前一代学者的力量又更为强大。任何一个高等院校教育系,如能拥有这样一支学术队伍都会令人感到自豪!

三

令后人感到敬佩的还在于这些前辈教授们所取得的业绩。试举其代表论之,以观全豹。

1923年,将及而立之年的孟宪承撰文与人讨论教育哲学的取向与方法问题,提出:教育哲学研究是拿现成的哲学体系加于教育,而将教育的事实纳入哲学范畴?还是依据哲学的观点去分析教育过程,批评现实教育进而指出其应有价值?他认为后者才是可取的。理由是:教育哲学是一种应用哲学,应用对象是教育;教育哲学研究导源于实际教育需要,是对现实教育的反思与批评,而其结论也需要经过社会生活的检验。这样就倡导了以实际教育问题为出发点的教育哲学,为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的转型,即从以学科为出发点转向以问题为出发点,转向更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儿童,从哲学层面作出了说明。之后,不刻意追求体系化知识,而以问题研究为主、从儿童发展出发思考教育问题成为一时潮流。1933年,孟宪承出版《教育概论》,就破除了从解释教育和教育概念出发的教育学理论体系,而代之以从“儿童的发展”和“社会的适应”为起点的教育学叙述体系。在中国,以儿童发展为教育学理论的起点,其首倡者很可能就是孟宪承。1934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其中的《教育概论》纲目与孟宪承著《教育概论》目录几乎相同。而孟著自1933年出版至1946年的13年里共印行50版,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学教科书之一。可以看出孟宪承教育学思想对中国教育学理论转型、教育学学科建设、课程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响。

1921年,创始于美国、流行于欧美国家的一种新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道尔顿制传入中国,因其注重个别需要、自主学习、调和教学矛盾、协调个体与群体等特点,而受到中国教育理论界和中小学校的欢迎,一时间,诸多中小学校纷纷试行道尔顿制,声势浩大。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是其中的典范。当时主持东南大学附中实验的正是廖世承。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严格按照教育科学实验研究方法与程序要求进行,从实验的提出、实验的设计、实验的实施、实验结果分析各个环节都做得十分规范,保证了实验的信度和效度,在当时独树一帜。尤其是实验设计者是将实验设计为一个与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进行比较的对比实验,以期验证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长短优劣。在实验基础上,廖世承撰写了《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报告依据实验年级各科实验统计数据、实验班与比较班及学生、教师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了实施道尔顿制的优点与缺点,得出了十分明确的结论:道尔顿制的特色“在自由与合作”,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很难实行;“班级教学虽然有缺点,但也有它的特色”。廖世承和东南大学附中的实验及报告,不仅澄清了人们对道尔顿制传统教学制度的认识,还倡导了以科学研究解决教育问题的风气,树立了科学运用教育研究方法的楷模,尤其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了如何对待和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此外,廖世承参与创办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首开心理测验,所著《教育心理学》和《中学教育》,在中国都具有开创性。

1952年曹孚离开复旦大学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是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1951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成的《杜威批判引论》出版。书中,曹孚将杜威教育思想归纳为“生长论”、“进步论”、“无定论”、“智慧论”、“知识论”和“经验论”,逐一进行分析批判。这一分析框架并非人云亦云之说,而是显示出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把握,超越了众多杜威教育思想研究者。他当时就指出杜威教育思想的主要缺陷,即片面强调活动中心与学生中心,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对杜威教育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孟宪承曾称道:“曹孚是真正懂得杜威的!”后来,刘佛年在为《曹孚教育论稿》一书所做的序中也评价说:“这是我国学者对杜威思想的第一次最系统、最详尽的批判。”曹孚长于理论,每每有独到之论。50年代的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界,先是亦步亦趋地照搬苏联教育学,又对包括教育学在内的社会学科大加挞伐,少有人真正思考教育学的中国化和构建中国的教育学问题。曹孚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包括哲学、国家的教育方针

政策、教育工作经验、中国教育遗产和心理学五方面；针对当时否定教育继承性的观点，他提出继承性适用于教育，因为教育既是上层建筑，也是永恒范畴；对教育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批评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为标准，从哲学、政治立场出发的评价原则，主张将哲学思想、政治立场和教育主张区别而论，主要依据教育思想来评价教育人物；他认为，即使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也有可以吸取和改造的。在当时环境下，曹孚之言可谓震聋发聩。

1979年，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新时期”全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教育学教材。之前，从1962年至1964年曾四度内部印刷使用，四度修改。“文革”中还被作为“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1961年初，刘佛年正式接受中宣部编写文科教材教育学的任务。当年即撰写出讲授提纲，翌年完成讨论稿。虽然这本教育学教材在结构上留下明显的凯洛夫《教育学》痕迹，但也处处体现出作者对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思考。教材编写体现了对六方面关系的思考和兼顾，即政策与理论、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历史与理论、正面论述与批判、共性与特性。事实上这也可以作为教育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在教材编写之初，第二部分原拟按德育、智育、体育分章，但牵涉到与学校教学工作的关系，出现重复。经斟酌，决定按学校工作逻辑列章，即分为教学、思想教育、生产劳动、体育卫生等章，由此形成了从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到研究学校具体工作的理论逻辑，不失为独特的理论建构。1979年教材出版至1981年的两年间，印数近50万册，就在教材使用势头正好之时，是编者主动商请出版社停止继续印行。但这本教育学教材的历史地位却并未因其辍印而受到影响，因为它起到了重建“新时期”中国的教育学理论和教材体系的启蒙教材作用。

不只是以上几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创系教授在各自所从事的研究领域都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如，常道直对比较教育学科的探索与开拓，萧承慎对教学法和教师历史及理论的独到研究，赵廷为、沈百英对小学各科教学法的深入探讨，沈灌群对中国教育史叙述体系的重新建构，赵祥麟对当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开创性研究，等等，对各自所在的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被载入学科发展的史册。还有像欧元怀，苦心经营大夏大学二十多年，造就出一所颇有社会影响的著名私立高等学府，为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办学创造了重要的空间条件。所有前辈学者们的学术与事业，都值得我们铭记不忘。

四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此次编纂《大夏教育文存》视为一次重新整理和承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契机。

我们的宗旨是:保存学粹,延续学脉,光大学术。即,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精华加以保存,使这些学术成果中所体现的学术传统得以延续,并为更多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学者能有机会观览、了解和研究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和人生,激发起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实现我们的宗旨。

就我们的愿望而言,我们很希望能够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一代代前辈学者的代表作逐步予以整理、刊布,然而工程浩大,可行的方案是分批进行。分批的原则是:依据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代表性、当时时代的影响和对后世影响的实际情况。据此,先确定了第一辑入选的11位学者,他们是:孟宪承、廖世承、刘佛年、曹孚、萧承慎、欧元怀、常道直、沈灌群、赵祥麟、赵廷为、沈百英。

《大夏教育文存》实际上是一部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后曾经在教育学科任教过和任职过的著名学者的代表作选集。所选入的著作以能够代表作者的学术造诣、能够代表著作撰写和出版(发表)时代的学术水平、能够为当下的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发展提供借鉴为原则。也有一些作品,我们希望能为中国的教育学术事业的历程留下前进的脚步。

《大夏教育文存》入选者一人一卷。所收录的,可以是作者的一部书,也可以是若干部书合为一卷,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代表性论文的选集,还包括由作者担任主编的著述,但必须是学术论著。一般不选译著。每一卷的选文,先由此卷整理者提出方案,再经与文存总主编共同研究商定选文篇目。

每一卷所选入著述,在不改变原著面貌前提下,按照现代出版要求进行整理。整理的内容包括:字词和标点符号的校订,讹误的订正,专用名称(人名、地名、专门术语等)的校订,所引用文献资料的核实及注明出处,等等。

每一卷由整理者撰写出编校前言,内容包括:作者生平、学术贡献、对所选代表作的说明、对所作整理的说明。每一卷后附录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五

编纂《大夏教育文存》的设想是由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己的历史和传统整理清楚,告诉后来者,并使之世代传递下去。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载体就是我们的前辈们的代表性著述,我们有责任将前辈的著述整理和保护下来。他报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将此项目立项为“华东师范大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获得资助。还商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支持和资助,立项为出版社重点出版项目。可以说,范国睿教授是《大夏教育文存》的催生人。

承蒙范国睿教授和时任教育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汪海萍教授的信任,将《大夏教育文存》(第一辑)的编纂交由本人来承担,能与我国现、当代教育史上的这些响亮名字相伴随,自是莫大荣耀之事。要感谢这份信任!

为使整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孙培青、陈桂生两位先生能够担任文存的顾问,得到他们的支持。两位先生与入选文存的多位前辈学者曾是师生,对他们的为人、为学、为师多了解,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十分有价值的指点,如第一辑入选名单的确定就是得到了他们的首肯。对两位先生我们要表示诚挚的感谢!

文存选编的团队是由教育学系的部分教师和博士、硕士生所组成。各卷选编、整理工作的承担者分别是:孟宪承卷,屈博;廖世承卷,张晓阳;刘佛年卷,孙丽丽;曹孚卷,穆树航;萧承慎卷,王耀祖;欧元怀卷,蒋纯焦、常国玲;常道直卷,杨来恩;沈灌群卷,宋爽、刘秀春;赵祥麟卷,李娟;赵廷为卷,王伦信、汪海清、龚文浩;沈百英卷,郭红。感谢他们在选编和整理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研究生董洪担任项目秘书工作数年,一应大小事务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十分感谢!

尤其是要感谢入选文存的前辈学者的家属们!当我们需要了解前辈们的生平经历和事业成就,希望往访家属后人,我们从未受到推阻,得到的往往是意料之外的热心帮助。家属们不仅热情接待我们的访谈,还提供珍贵的手稿、书籍、照片,对我们完成整理工作至关重要。谢谢各位令人尊敬的家属!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文存出版的大力支持!也感谢资深责任编辑金勇老师的耐心而富有智慧的工作,保证了文存的质量。

感谢所有为我们的工作提供过帮助的人们!

杜成宪
2017年初夏

一、作者生平及贡献

刘佛年,1914年4月1日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大林乡。1929年从长沙明德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本科,1935年毕业,又考入广州学海书院。1937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曾到德国柏林作短期考察。1940年初回国,先后在西北联合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3—1946年先后在醴陵开明中学、攸县临时中学任英文教师。1946年8月,刘佛年被聘为暨南大学教育系教授,主授教育哲学和哲学概论。1949年5月上海新中国后,担任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不久,暨南大学停办,刘佛年又担任上海师范学校校长兼复旦大学教授,以及上海市教育工会副主席。1950年参加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任副秘书长。

1951年,中央决定在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基础上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受命参加建校的筹备工作,任常务委员。1951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正式成立,刘佛年被任命为教务长兼教育系系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下放到嘉定县马陆公社劳动改造。1978年平反昭雪后,刘佛年被任命为上海师范大学(“文革”期间,华东师范大学曾与上海其他几所高校合并成立“上海师范大学”,后分别复校)校长。1984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全国比较教育学会理事长、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理事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会长、上海哲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教育工会名誉主席、《中国教育大辞书》编委会总顾问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会副主任等。2001年5月12日在上海逝世。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

刘佛年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在他的倡导与努力下,华东师范大学于1980年率先在全国成立了教育科学学院,积极推进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促使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走在全国前沿。刘佛年不仅关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还关注教育改革的动态、发展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学理论突破凯洛夫《教育学》框架、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上影响重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主持编写《教育学(讨论稿)》,为教育学理论“中国化”的推进做出了

重要贡献,形成了影响中国教育学人数十年的教育学思考方式与研究方式。从1978年起,刘佛年先后在《红旗》、《光明日报》、《文汇报》、《教育研究》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20多篇。除《教育学(讨论稿)》外,另有《杜威思想的再认识》、《唯物论与教育》等数部著作问世。

二、对所选代表作的说明

本卷所选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具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学专业教材,在中国探索自身教育学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教育学学科意义、理论价值与时代价值。

(一) 刘佛年与《教育学(讨论稿)》

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其原稿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它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寻求教育学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尝试,对当代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凯洛夫的《教育学》在中国流行广泛,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激发下,突破苏联教育学框架、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理论被提上日程。编选大学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中共中央决心加强文科各专业的理论建设,决定由中宣部负责,组织全国的力量编选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教育、政治教育、外语等14个专业的教材。1961年2月19日,周扬在上海召开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正式提出请刘佛年主编文科教材中的“教育学”,并希望在半年内出书。之后,刘佛年决定教育学编写组第一步应于1961年6月底先编写出《教育学讲授提纲》,该提纲完成后,共分12章,每章1万余字。1961年8月,主持文科教材建设的周扬在审阅《教育学讲授提纲》后,明确要求编写组在1961年下半年将《教育学讲授提纲》印发,1962年上半年拿出《教育学》初稿,1962年下半年出版。到1963年,编写组完成了《教育学(讨论稿)》,全书共14章,另有绪论和美育各一章,篇幅也比此前的《教育学讲授提纲》扩大很多。为了作进一步修改,刘佛年将讨论稿在内部发行,在华东师范大学试用,先后“四次内部印刷试用,四度修改补充,历时三年许”。^①

1964年,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教育学(讨论稿)》的修改工作停顿下来。“文

^① 郑金洲、瞿葆奎:《中国教育百年》,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革”期间,刘佛年及其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受到严厉批判。“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6月,应教育学教学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刘佛年主编的这本《教育学(讨论稿)》。这本编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教材,在时隔近20年后出版时,作了一些修改,如删除初稿书中强调阶级斗争等内容,另一方面加入“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电化教育”两章,以适应20世纪70年代末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经过修改,《教育学(讨论稿)》分上下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上册第1版于1979年5月出版,下册第1版于1979年8月出版。同年,合订本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到1981年停印,已累计印刷4次,近50万册。

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成为建国后影响重大的教育学教材之一,为中国教育学理论的推进以及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是一项凝结着集体智慧的成果。尤其是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的不少教师都参与其中。但也应当看到,此书也集中体现了刘佛年有关教育和教育学的基本认识,体现了他对教育学理论的思考和探索。此次华东师范大学编纂出版《大夏教育文存》,所编各人各卷采取的是代表作制。我们认为,刘佛年卷选入《教育学(讨论稿)》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它留下了一位教育学家的教育学求索的足迹,也是一代教育学者的求索足迹。

(二)《教育学(讨论稿)》之特点

本卷所选的《教育学(讨论稿)》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合订本。全书分14章,30余万字,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明确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系统论述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大跃进”的“教育革命”期间,出现否定教育规律而以领袖的教育论述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代替教育理论的做法,《教育学(讨论稿)》则试图克服这一问题,从教育规律出发系统地阐述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该书绪论即指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教育学所要研究的是客观存在着的教育现象,其任务是“从客观的教育现象和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去揭露它的规律。”就教育学的特殊性一面来说,“我国的教育学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是社会主义教育学”,我国的教育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中的问题,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学“还必须批判地继承遗产”,“批判地继承具有人

民性的、对我们有用的遗产,应当批判各种反动的教育思想,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明确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是进行教育研究与理论思考的前提,《教育学(讨论稿)》在此基础上,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性质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结合起来,将对教育客观规律的探索与对教育特殊性的考察联系起来。

其二,该书的章节安排,在继承凯洛夫《教育学》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体现出自己的特色。从总体结构来看,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基本上继承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结构。^① 绪论部分主要探讨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学的阶级性、教育学的内容、学习教育学的意义以及教育学的研究等。正文共十四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学的一般原理。即教育的本质(第一、二章)、教育的目的和方针(第三章)、学校教育制度(第四、五章)。第二部分讨论普通学校中的教学工作(第六、七章)、思想工作(第八、九、十章)、生产劳动(第十一章)、体育卫生工作(第十二章)等。第三部分讨论普通学校的教师(第十三章)以及学校行政(第十四章)。《教育学(讨论稿)》还有三个附录,即教育与经济发展、电化教育、美育,从三个附录的内容看,则可分别隶属于第一、第二部分。

不过,《教育学(讨论稿)》并不是简单模仿凯洛夫《教育学》,而是注意克服1958年以前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教条主义倾向,充分体现中国教育学者独立的思考。据刘佛年回忆,在编写组最初编写的《教育学讲授提纲》中,第二部分规划了教育计划、德育、智育、体育四章,但在编写时遇到了具体困难:第一,德育、智育、体育的意义、任务、内容等虽然可以分别列出,但在讨论德育、智育、体育的途径时又会重复。第二,智育中要讲到“教学”,德育、体育也要提到“教学”,而《教育学讲授提纲》又将“教学”列在“智育”一章下讨论,造成了“智育”等同于“教学”的印象。第三,若按照德育、智育、体育分别独立来安排《教育学》教材的结构,又会使学校的教学等主要工作得不到充分反映。编写组经过再三斟酌,最后还是决定按照学校的主要工作来分列章目。^② 全书的章节安排整体上是遵循从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到研究学校工作或教育的具体方面的逻辑而展开的。

① 周谷平主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历程:选择·融合·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② 刘佛年著,金一鸣整理:《刘佛年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其三,在吸取外国(主要是苏联)教育学及其他研究成果的同时,注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反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过程。该书在编写过程中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著作、语录作为书写材料,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953)、《列宁选集》(1962)、《资本论》(19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等,也充分利用了当时颁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1)、《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3)、《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3)、《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等政策文件。同时还引用中外教育家的重要思想理论,如孔子、荀子、朱熹、王守仁、夸美纽斯、巴泽多、凯洛夫、克鲁普斯卡雅等,力求吸收人类教育文明的成果,体现出古与今、中与外、史与论的结合。

整体而言,《教育学(讨论稿)》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教育学之解,无论对教育学性质的判断与规律的找寻、对教育学具体研究内容的安排与设定、还是全书所引的材料,都与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密切相关。实现教育学的“中国化”建构之路,突破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框架,形成中国教育学独特的理论思考与表达,是刘佛年《教育学(讨论稿)》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1961年2月—8月,周扬对《教育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六点编写原则,对《教育学(讨论稿)》形成了直接影响,这六点编写原则体现了编写过程中应注重的关系式思维,分别是:“关于政策与理论的关系、关于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问题、关于史论结合问题、关于正面论述与批判问题、关于共性和特性问题。”^①这六点编写原则不仅构成了《教育学(讨论稿)》的编写原则,也形成了对中国教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学思考方式与表达方式:通过政策与理论的结合,尝试改变凯洛夫教育学的说教方式,尝试重构教育经验与理论的表达方式,努力将理论思维融入到《教育学(讨论稿)》中;尝试在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中进行教育学理论表述;对教育学普遍性问题和特殊性问题的找寻与探讨等。时至今日,这些方面仍旧是教育学研究中不可规避的基本问题。

作为特定时代环境下的产物,《教育学(讨论稿)》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烙印。

^① 陈桂生,刘佛年《教育学》述评,《江西教育科研》,1998年第3期,第9页。